

对苏联“公开性”改革中大众传媒的重新审视 (1)

作者: 侯丽军

[摘要] 1985年至1991年间, 苏联最后一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公开性”政策与苏联的解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公开性”改革及其中的传媒变革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但戈尔巴乔夫在推行“公开性”政策中的失误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公开性”改革的积极意义, 更使媒体成为加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关键词] 苏联; 公开性; 大众媒介

一、“公开性”概念的起源与演变

“公开性”(Glasnost)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发明创造。据有关学者考证, 该词源于斯拉夫古教堂用语“Glas”, 指声音, 演讲或宣传, 并不像“对公众负责”这个概念那样, 含有完全的坦率或诚实之意。“公开性”具有独特的法律含义, 指与秘密审判相反的公开法庭听证会。自从彼得大帝在18世纪对俄国的官僚体制实行合理化改革之后, “公开性”这个词就与苏俄的统治者结下了不解之缘。19世纪, 所谓的“开明的官僚”用“公开性”这个词作为武器, 反对像果戈里在戏剧《钦差大臣》里所描绘的那种官僚专制、封闭和腐败。尽管“公开性”曾对1861年废除农奴制起过作用, 但它并不旨在向独裁者的权威挑战, 而是要维护沙皇的地位, 通过建立一个中庸的言论机构, 部分地缓解由压制思想而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紧张。(李秀萍, 1988: 35)

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就已提出: “完全的公开性”和一切经过选举是“广泛民主原则”包含的“两个必要条件”。(《列宁全集》, 1986, vol.6: 131)他认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 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 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的”。(《列宁全集》, 1959, vol.5: 448)至于经济活动的公开性, 列宁指出: “报刊应当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 也就是说, 要公开报道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人曾经竭力不让群众知道的东西”。(《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 1983: 497)这种公开报道, 将会“使国家所有的公社知道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 其次可以评比这个和那个公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果; 最后可以保证各个公社运用其它公社取得的经验, 可以保证互相交换在国民经济或国家管理的有关部门中显得最好的人力和物力”。(《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 1983: 501)此后, 列宁又在其他著作中多次提及公开性问题。但是, 由于当时苏维埃政府面临着艰难的国内外环境, 以及列宁的早逝, 公开性原则未能得到广泛实行, 也未有什么新发展。

在斯大林时期,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苏联和苏共成为世界上最讲保密的国家和政党。高度保密制影响到许多方面。这种制度是党政机关得以不受监督地行使大权的基础。它使得普通党员群众“对上级领导工作情况难以了解, 因而也难以监督”。(刘克明, 2003: 6)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执政, “公开性”作为政治术语才又被重新提出。(刘克明, 金挥, 1990: 651)1977年, 苏联宪法中正式把“扩大公开性”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固定了下来。但是, 这一原则在当时现实生活中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80年代初, 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执政时, 虽也曾多次谈及这一问题, 但均缺乏切实的保证措施。(刘克明, 金挥, 1990: 676)

对公开性最为重视、说得也最多的还是戈尔巴乔夫。(齐向等, 1992: 274)早在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的1984年, 他就曾论述过公开性问题, 认为“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 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 广泛、及时和公开通报消息, 是信任人民、尊重他们的理智和感情, 以及他们自己能够搞清楚

某些事件的能力的证明,种做法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国家机关的公开性是同官僚主义弊端进行斗争的有效工具”。(《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87:1)1986年9月,戈尔巴乔夫在视察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时,又谈到“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广泛的公开性、公开讨论我国社会生活最紧要的问题、国家的发展。这将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新的,完全新的气氛。”并呼吁“我们应当扩大公开性,应当将更多的事公诸于众,我们的人应当知道劳动集体、区、州、共和国、全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谈改革与民主化》,1987:8)

1987年11月的苏共中央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出,“公开性和民主应当充分地、可靠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公开性和民主的问题,这是人民参加管理地问题,不能只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上电视和报纸。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没有人民,不同人民商量,我们就不能解决任何一项重大任务。这就是说,必须发扬公开性,开展民主化进程,以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在苏共中央会议上谈党在改革中的作用和任务》,1987:32)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其出版且轰动国际社会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郑重发出呼吁:“让公开性大放光明!”(戈尔巴乔夫,1987:88)一时间,“公开性”和“改革”两个词,成了戈尔巴乔夫政策与作风的标志词。

英国学者布赖恩·迈克奈尔曾这样形容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公开化运动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潜在的激进民主主义,并将其呈现在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面前;作为一种尝试,它试图恢复斯大林主义之前的一些政策,那时,布尔什维克们能够堂而皇之地成为革命的、进步的力量。自从1920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试图建立一种存在争论和差异的,而不是统一和严格管制的政治文化。(埃尔德里奇,2004:71)

二、“公开性”改革的主要内容

根据六年中戈尔巴乔夫指导思想的演变和苏联改革的曲折历程,“公开性”改革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起始阶段(1985—1986年)、扩大阶段(1987—1988年)和舆论失控阶段(1989—1991年)。

戈尔巴乔夫设想的“公开性”改革在1985年开始有所行动。前任《真理报》总编辑维·阿法纳西耶夫在回忆录中提到,1985年4月以前,公开性实际上还不曾有,公开性是逐渐成熟起来的,尽管某些报章无论是在1985年4月以前还是以后都曾做过超出允许限度的事情。(阿法纳西耶夫,1993:160)

“公开性”展开的第一个行动是1985年5月戈尔巴乔夫的列宁格勒视察之行。此行成为苏联国内轰动一时的政治新闻。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苏共领导人还是第一次走上街头与群众见面;视察中,戈尔巴乔夫让政府车队停下来,接着下车走向群众,回答他们的问题,并试图解释国内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

随后不久,戈尔巴乔夫接受了美国《时代》杂志和三个法国电视记者的采访,这是“公开性”改革的突破口之一。戈尔巴乔夫的思维和口才改变了领导人在观众中的刻板形象,这在苏联国内和世界上都引起广泛的关注。戈尔巴乔夫同媒体打交道的新风格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树立了榜样。

1986年2月13日的《真理报》发表女记者达吉亚娜·萨摩里斯的文章,题为《净化,开诚布公的谈话》。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公开性”改革正式启动的标志。文章用尖锐泼辣的口吻批评了党内官僚主义、滥用职权、裙带风、挥霍公款等腐败现象,并建议“净化”共产党,把腐败分子从党内清除出去。至此,“公开性”改革成为苏联媒体批评制度的新出口,这鼓励了在报刊、广播、电视上对制度缺陷发表批评意见的行为。

同时,“公开性”也拉开了苏联政治改革的序幕。它带来了信息开放和共享,意味着每个公民都有权知道和应该了解国内外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没有经过修饰和限制的事实真相。于是,大众传媒理所当然地担负起帮助民众了解真相的任务。于是,在80年代后期的苏联,大众传媒和“公开性”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

具体说来,“公开性”改革中针对大众传媒的变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加强重要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的时效性。戈尔巴乔夫每周定期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公布政治局例会以及中央和政府重要会议讨论的问题和决定,内容比过去详细;

其次、苏联领导人和舆论工具改变了过去“封锁消息”的报喜不报忧的一贯做法,开始通报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事故。1986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如苏共二十七次、苏美首脑会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都做了现场转播;

第三,增加对社会阴暗面的公开揭露,并将触角逐渐伸向以往的“禁区”:如军费的实际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科研、国防资金与物资的有效利用;

第四,允许在媒体上对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和当前的改革措施进行争论;

第五,放宽对外国记者的限制和严格审查西方报刊的政策,停止对美国之音等外国电台的干扰,允许外国报

刊在苏联报亭上出售，这样苏联公众便有机会接触外国大众传播媒介，从而扩大了消息来源；

第六，作为新闻传播主体的新闻机构获得一定的自主权。从1986年4月起，苏联的新闻机构报道什么、怎么报道，都由编辑部决定。批评领导人的稿件由社长或总编辑签发，无需经过上级或有关党委；

第七，放宽对新闻出版界的审查，除了有关国家和军事的机密外，其他一切内容均由报刊和出版物的总编辑负责。1987年至1988年间，戈尔巴乔夫先后取缔了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大部分功能；

第八，1990年6月12日，苏联议会通过《苏联出版与其他大众传播媒体法》，主要是取消了新闻检查，允许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办报。新闻出版法扩大了媒体创办者、编辑部和出版社的自主权。这意味着苏联新闻媒体的体制和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三、“公开性”与传媒改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公开性”改革之前，苏联社会还处在一种封闭、僵化、精神压抑、社会生活缺乏活力的状态之中。尽管苏联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地采取一些变革的尝试，但是没有一次是有结果的。因为，所有这些尝试都没有触及制度的实质——所有制关系、政权结构、党对政治与精神生活的垄断。

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苏联媒体的主要角色仍然是社会控制机关，而不是政府和民意之间沟通的桥梁。在不尽真实、片面报道和对社会进行严格意识形态控制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而人民则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漠不关心。

1985年，戈尔巴乔夫作为契尔年科的继任者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的政治经济改革亟需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但面对来自铜墙铁壁般陈旧政体和一批思想保守的党内实权派的阻力，要想让旧体制的弊端暴露出来，并将民众的热情调动起来，就必须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因此，他倡导大众传媒开创公开报道事实、揭露问题、突破各种禁区、大胆批评不正之风、讨论各种社会问题的风气。

回顾整个改革的历程，“公开性”改革中的大众传媒为苏联社会进步发挥的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作为“公开性”的一个重要成果，苏共中央开始通过传媒公开重大党务政务活动。如召开全国党代会、中央政治局会议、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各地视察工作、跟群众谈话、与外国政要会晤、答记者问等等，新闻媒体都要作公开报道。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十年》中有这样的描述：“1988年7月13日，电视台、广播电台及中央各报刊的记者们破天荒地应邀来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会场上。此举可以看作是我国政府活动的一个新时代——公开性、坦率性、面向人民、同人民对话的时代的开端。”（雷日科夫，2006：232）

其次，“公开性”推动了重大问题决策过程的公开。政治决策是政治体制通过一定渠道和机制以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容纳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意愿和意志，最后达成最大成效的过程。政治决策不应是封闭式的、脱离大众的、不能触摸的，而应是开放的、参与式的、与大众合为一体的。而在过去，发生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一切，对苏联普通老百姓来说，始终是个谜。政府下达的命令和指示全出自圈子很窄的实权人物之手，没有任何的社会照看。但是在“公开性”的推动下，苏共逐渐改变了这种做法，开始规定在讨论和决定最为迫切的、重大的、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经济问题时，首先通过新闻媒体使广大人民看到政府会议的实况，使政府的工作向人民公开并为他们所理解，就把政府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从而加强了与人民的联系。（雷日科夫，2006：235）

第三，新闻媒体开始及时通报重特大灾难事故情况。以往，苏联党政机关对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灾难或恶性事故，通常都采取遮掩、搪塞或避而不谈的做法，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在报刊上发布一则简短或含糊其词的官方消息。苏共27大以后，苏联部长会议改变过去报喜不报忧的做法，通过新闻媒体对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客轮沉没事故进行了及时报道，政府并就此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国内外记者介绍人员伤亡情况。

第四，新闻媒体开始曝光一些社会问题与弊端。比如，黑市交易、贩毒吸毒、妇女卖淫、干部搞特殊化、压制批评、贪污受贿问题等等，都进入可以报道的范围。

第五，新闻媒体公开讨论社会热点问题。为激发广大听众、观众的改革热情及参与意识，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常常就经济问题、社会政治热点问题组织群众进行公开讨论。《苏维埃文化报》等报刊还开辟“直言”专栏，让人民群众各抒己见。有时，报刊还安排领导人与普通公民在媒体上对话，吸引了许多读者。正因为媒体

贴近生活、贴近大众，所以呈现出活跃的局面，1986年秋季报刊征订时，许多报刊销量大增，比如，《苏维埃俄罗斯报》增加100万份，《共青团真理报》增加300余万份。(戈尔巴乔夫，2002a: 153)。

第六，政府和媒体的沟通变得更加顺畅自如。“社会生活，日益增长的要求，事件的尖锐性都要求政府的工作跟上变化的形势，既要抓好各项管理决策工作，又要做好信息沟通工作。”(雷日科夫，2006: 236)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说：“几家主要报纸的记者们经常被邀请采访讨论非常重要的、人们最为关注的议题的部长会议及其主席团的会议。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要在政府里准备大量能够反映讨论过程的分析内容、批判性观点和尖锐的分歧的材料，紧急发往塔斯社，用于刊登在当日晚报或次日晨报上。”(雷日科夫，2006: 238-239)

此外，“公开性”改革还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莫斯科的许多外国大使和新闻专员都得到允许，访问苏联的情报局，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也可以在该局得到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信息。另外，政府还新辟了部长会议领导人和专家会见新闻界的场所，制定了建立自己的出版基地、电视和广播直播室等方面的计划。(雷日科夫，2006: 242)

综上所述，正如雷日科夫所说，公开性作为民主的一个极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特征，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实行它是不可避免的。(雷日科夫，2006: 246)然而，苏联领导层在推行“公开性”政策中的失误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积极意义，更使媒体成为加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续见《对苏联“公开性”改革中大众传媒的重新审视 (2)》

[回首页](#)

来源：《中国传媒报告》
阅读：507 次
日期：2008-08-23

【 双击滚屏 】 【 评论 】 【 收藏 】 【 打印 】 【 关闭 】 【 字体：大 中 小 】

上一篇：地方都市报奥运报道模式创新

下一篇：对苏联“公开性”改革中大众传媒的重新审视 (2)

>> 相关文章

- 《编辑力初探1.0：写给编辑人的信》(39)
- 爱心铸品牌——徐州报业传媒集团6年助学提升品牌影响力
- 《编辑力初探1.0：写给编辑人的信》(38)
- 《编辑力初探1.0：写给编辑人的信》(37)
- 奋力开创新华社战略转型和事业发展新局面
- 《编辑力初探1.0：写给编辑人的信》(36)
- 转型升级 破解难题 加快发展——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新探索
- 《编辑力初探1.0：写给编辑人的信》(34)

发表评论

jn  jn  jn  jn  jn  jn  jn 
jn  jn  jn  jn  jn  jn  jn 
点 评： 字数0
用户名： 密码：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